

□ 邓田田

周公，姓姬名旦，是商末周初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。在其执政的七年里，他分封天下、拟定政治制度、扫清反叛势力、营建新都洛邑，奠定了西周近三百年的统治基业。此外，他还完善了宗法制、井田制和嫡长子继承制，用礼乐文化来彰明亲亲、尊尊之道，开儒家思想之先河，被后世称作“先儒”和“元圣”。周公是孔子之前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思想家，贾谊曾这样评价他道：“孔子之前，黄帝之后，于中国大有关系者，周公一人而已。”

现在留存下来的直接记录周公思想、言行的历史文献中最可靠的是《尚书·周书》中所收录的与周公有关的11篇文章。这些文章多为记言体，只有《金縢》是《尚书》中少见的一篇以周公为主人公的叙事文。

在《金縢》篇中，史官记录了周初复杂的政局。西周初年，虽然周人打败了强大的殷人，但新政权的根基并不牢固。一方面，殷商旧贵族从未停止对周王朝的反抗。再加上周人原来一向在岐周辛苦劳作，克难克艰，一旦入主繁华的殷畿，很快就染上了殷人骄奢淫逸、好逸恶劳的不正之风。这些困难和问题，使开国之君周武王姬发满怀忧惧、夙夜难寐。日夜不息的操劳与忧虑让武王很快就身染

重病。众所周知，殷周之际还是一个重巫祭鬼的时代，当时的人们迷信占卜，崇拜鬼神，相信通过对上天和鬼神的祷告可以消灾祛病。武王病倒之后，周公便进行占卜，卜筮的结果显示是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三位祖宗的魂灵在召唤姬发上天侍候，周公便筑台祷告，自愿以自己为质、代替武王赴死，祈求祖宗的神灵保佑武王病愈。之后周公便将祷书封好，依礼放入专门收藏向祖宗祷告的文书的文件柜——金縢里保存，这就是《金縢》篇名的来历。武王最终还是忧劳成疾去世了，临死之前，考虑到太子诵年少不能应对复杂的政局，武王便提出由其弟、开国功臣之首周公来继承王位。

为了避免延续殷商兄弟弑及与父死子及交互进行的混乱继统法、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对政权交接的稳定作用，周公流着泪坚决拒绝了继承兄长的王位，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危，周公

同意摄政称王，以待周成王长大亲政。果然，在武王死后，周人的内部矛盾便开始率先大爆发了。据《金縢》记载：“武王既丧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，曰：‘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’”周公统摄大局，引起了野心勃勃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的嫉妒，他们四处散布谣言，诬陷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。

在谣言的怂动下，周公在群臣中的威信被动摇，成王也对周公心存不满。野心家管叔、蔡叔则趁机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及一些东方小国发动了叛变。周公于是作《大诰》以剖明心迹、号令群臣、威震天下。在上下同心同德的统一意志下，周公率师东征，杀武庚，杀管叔，流放蔡叔，灭东方五十国，“周公居东二年，则罪人斯得”。

周公东征归来之后，恐政务稍有疏漏，愈加勤政，据《史记》记载：

周公“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”。可见周公理政之繁忙辛劳。待周公摄政七年之后，则朝内纲纪分明、百姓安居乐业、王朝固若金汤，此时成王也长大了，可以亲政了，周公便毅然退出摄政王的王位，面北称臣，把一切权力交给成王。

回归臣位之后，周公本期待自此便政风清正，不料却再一次遭到了小人的造谣诬陷，导致了“周公奔楚”事件的发生。《史记》里详细地记录了此事的前后经过。

成王年少的时候曾经病危，于是周公就剪下自己的指甲投入河水，向天神祷告说：“王还年少，没有主意，一切冒犯神灵的事情都是我姬旦一人所做的。如果上天要降罪的话，我愿意承担一切恶果。”祷告之后，周公将祷书封好，依礼收入放置向天神祷告文件的府库（和前面的金縢是不同的礼器）里。后来成王亲政后，就有奸

险的小人向成王诋毁周公，说：“周公旦打算造反作乱已经很久了，王要是不先下手的话，恐怕要出大事呀！”成王听信了小人的毁谤，对周公产生了嫌疑。周公被疑之后，既为避嫌与自保，也为顾全大局、不激化内部矛盾，被迫出奔到遥远陌生的楚地。西周之时，大贵族若因故逃亡到兵强力壮的大诸侯国，则有蓄势谋反之可能，楚地在西周初年尚未封国，属于蛮荒边远、兵弱人贫之地，周公奔楚，既有自证清白之意，也有自我放逐的心灰意冷之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次成王检看府库里的祷神文件，看到了周公曾为自己祈祷的祷书，这才终于知晓周公的真心。于是杀死进谗的小人，亲自迎回了周公。

成王迎回周公之后，虽然君臣和好如初，但由于谗言的余毒已在成王心中种下忌惮猜疑的种子，成王的心里仍有隐结未消。这个心结，一直到

周公去世之后才解开。据《金縢》记载：周公去世之后的某年秋收时节，发生了天灾，成王恐惧是因祭祖礼仪有失而导致了祖宗在天之灵发怒，便打开了专门收藏祭祖文书的金縢来清检，偶然看到了周公宁愿以身代武王赴死的祷书，再追忆起周公这一生对自己始终如一的忠心耿耿、顾全大局的忍辱负重，成王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，于是决定以王礼重葬周公。

自古以来，最毒莫过离间计。纵然贤良如周公，也先被管、蔡流言于群臣之间，后被奸佞诽谤于成王之侧。然而周公之忠贞坚若金石，矢志不渝，忍辱负重，尽忠为国，不计个人的毁誉得失，终成千古贤臣之典范。诸葛亮说：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”量才德为本，量德辨忠奸。明辨忠奸、不受谗言，这正是为政者识人用人之要。白居易曾有诗云：“赠君一法决狐疑，不用钻龟与祝蓍。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材须待七年期。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？”周公因其所处的核心位置，容易成为谣言中伤的众矢之的，而他以一生坚守来自证其光明磊落，终而摆脱嫌疑，成全了灵魂的伟大。

中华春秋



张晓光/摄

校园新貌

中央党校校园内的小亭，亭上有张继书写的楹联《五休六书生奥妙，千山万水见精神》。

进入吉尼斯纪录的一口钟

□ 赵王玮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
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
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——（唐）张继《枫桥夜泊》

张继作为唐代不可胜数的小诗人中的一员，生平信息寥寥，已不可考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诗人能经历时间的淘洗，在文学史上留名，一定是有超常发挥的千古名作，《枫桥夜泊》就是他最著名的诗。就像俞陛云所说的：“作者不过夜行记事之诗，随手写来，得自然趣味。诗非不佳，然唐人七绝，佳作如林。独此诗流传日本，几妇稚皆习诵之。诗之传与不传，亦有幸有不幸耶！”不过古人在看此诗时，居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引发了一桩著名的诗坛公案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半夜敲钟是真是假

这诗流传到宋代时，大文豪欧阳修提出了一个质疑：“句则佳矣，其如三更不是撞钟时。”是啊，人们大多听闻的是晨钟暮鼓，半夜敲钟，合不合理呢？还是说这只是诗人的臆想，就像明代的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写的那样：“诗流借景立言，惟在声律之调，兴象之合，区区事实，彼岂暇计？”就是说诗人的目的是借景抒情，只要合乎声律兴象，事实与否，就不用去管它了。

不过这样的质疑很快就被别人反驳了。南宋的诗人范成大在编纂《吴郡志》时说：“欧公未尝到吴中，今吴中僧寺，实半夜鸣钟，或谓之定夜钟，不足以病继也。”那么证据在哪呢？

《苕溪渔隐丛话·后集》卷一五引《遐斋闲览》中的记载，“渠尝过苏州，宿一寺，夜半闻钟声，因问寺僧，皆云：分夜钟，曷足怪乎？寻闻他寺皆然。始知夜半钟惟姑苏有之。”也就是说，在苏州地区，半夜敲钟是很普遍的行为，欧阳修因为没去过吴地，所以不知道，只是想当然罢了。跑来打欧阳修脸的人还有大诗人陆游，他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还举出唐人于鹄在《褒中即事》诗中一句：“远钟来半夜，明月入千家。”褒中在陕西，他据此推测，半夜鸣钟制度在唐代是僧寺都有的。

那么在宋代，半夜敲钟制度就消亡了吗？并非如此，宋代学者陈岩肖自己就曾在姑苏为官，他说“每三鼓尽，四鼓初，即诸寺钟皆鸣，想自唐时已然也。”

那么，这样敲钟是所为何事呢？《唐诗纪事》中说：“此地有夜半钟，谓之无常钟。继志其异耳，欧阳修以为语病，非也。”有一种说法是撞钟报时，根据范成大的考辨，这个定夜钟传统来源已久，他引用《南史》中的话：“丘仲孚，吴兴人。少好学，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恨。”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期，就已有这个传统，读书人寒窗苦读，都恨时光过得快，所以久而久之，钟声自然有了独特的审美意蕴。

钟声已渡海云东

以古人的诗论看来，拿地名人入诗，并非易事。首先地名必须有历史，有一定的文化底蕴。像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这样的句子，并不费力，但如果效仿它写一句“通州城外金龙庙”，那可就是搞笑了。

而这口钟所在的寒山寺，位于苏州城西，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，历

史悠久。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以佛教为国教的朝代。梁武帝萧衍大力崇佛，修建佛寺，自己也是虔诚的佛教徒，甚至多次亲自入寺，舍身出家。群臣不得已只能耗费巨资将梁武帝从寺庙中赎出来，久而久之，甚至有了这样的景象——“都下佛寺五百余所，穷极宏丽。僧尼十余万，资产丰沃。”以至于后世，佛寺都可以被称为萧寺。

寒山寺就是在这样的崇佛环境中被建造起来的，起初它叫妙利普明塔院，并不起眼。传说唐代著名诗僧寒山离开天台山国清寺，来此居住，才让此地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。到唐贞观年间，希迁禅师在这里建寺，把寒山尊为寺里祖师，它才改名为寒山寺，成为吴中名刹。

寒山，又叫寒山子，他的一生带有三教合一的色彩，是中国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。他的诗理理精湛，语言通俗，风格多样，成就较高，自五四运动以来备受学人瞩目。我们可能没看过他的诗，却很容易听到他的一则传说：

昔日寒山问拾得曰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”拾得曰：“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”这在高僧境界之中，又带着几分俏皮的世味，就像他的诗一样：“闲自访高僧，烟山万万层。师自指归路，月挂一轮灯。”这四句信手拈来，虽是语体诗，但是并不油滑，反而颇有几分禅意。有这么一位诗坛与佛门的名人入驻，这寒山寺自然就有了入诗的底气。

如果没有张继的那首诗，寒山应当是寒山寺最大的招牌了。然而，自《枫桥夜泊》传世，那口钟就当之无愧

成了激发游人诗兴的妙音了。传说这口钟以历史悠久、声音洪亮而闻名遐迩，不想到了元朝末年，寒山寺毁于战火，后来虽经多次修理重建，却日趋败落，那口著名的古钟也就不知下落了。直到明代，本寂禅师主持建楼铸钟，四处化缘，还让江南才子唐伯虎写了一篇《姑苏寒山寺化钟疏》。在文末，唐伯虎写了一句偈语：“姑苏城外古禅房，拟铸铜钟告四方。试看脱胎成器后，一声敲下满天霜。”可惜没过多久，刚脱胎成器的它又“遇倭变，销为炮”，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。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巡抚陈夔龙重修寺庙，才重铸了一口大钟，悬于寺内西侧的八角钟楼上。

根据《寒山寺志》作者叶昌炽叙述，他曾见过唐钟模型的纸拓本，“唐钟冶炼超精，云雷奇古，波磔飞动，扣之有凌”。这么精湛的艺术品，显然是后来的新钟不能比的，那么有没有人知道古钟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康有为在庚辰年赴苏州寒山寺游览时，吊古伤今，题写了一首七绝：“钟声已渡海云东，冷尽寒山古寺枫。勿使丰干又饶舌，他人再到不空堂。”

他在诗中自注：“唐人钟已为日人取去”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今已不可考。只能从伊藤博文的赠钟铭文中的话里推断一二：“姑苏寒山寺，历劫年久，唐时钟声，空于张继诗中传耳。尝闻寺钟转入我邦，今失所在，于山田寒山搜索甚力，而遂不能得焉。”可见这个传说在中日两国都有耳闻。2008年11月，寒山寺大钟、大碑入选“吉尼斯”纪录，这固然是好事，却不禁教人想象，清钟尚且如此，若唐钟犹在，又该是如何一番景象？

地方志

公元1876年4月的一天，中国近代史舞台上出现了颇为壮烈的一幕：大队人马一路向西，一位大义凛然的统帅骑马在前，数名壮丁抬着一口棺材紧随其后。这位统帅叫左宗棠，时年69岁，挥师所向，是被阿古柏侵占的新疆。《清史稿》将这次军事行动记载为七个字：“宗棠与榘发肃州。”榘，即载棺以随。那么，左宗棠挂帅出征为何要抬棺随行呢？

1865至1875年间，中亚浩罕汗国军阀阿古柏，趁新疆内乱之机，侵吞了新疆大部分地区，自立为王，得到了沙俄以及英帝国的承认，沙俄军队则乘机强占了伊犁；1874年4月，日本借琉球“牡丹社事件”悍然出兵台湾。一时间，西北、东南狼烟并起，边塞、海域同时告急。尚未从农民起义硝烟中缓过气来的清政府，面对双重危机举棋不定，朝廷中“海防”与“塞防”之争相持不下。直隶总督李鸿章等认为，新疆、伊犁乃化外之地，荒漠千里，地旷人稀，花巨资收回得不偿失。再者，“海防、西征，力难兼顾”。主张放弃塞防，将这笔钱用于海防。陕甘总督左宗棠等认为，天山南北物产充盈，矿藏丰富，并非荒漠地，而是聚宝盆。我朝定鼎燕都，百数十年无外患，仰赖蒙古拱卫北方。新疆不保，则蒙古难安，外敌侵扰，防不胜防。若将万里腹疆拱手让给别人，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？主张“海防、塞防并重”，强调收复新疆，势在必行。

尽管多数朝臣持放弃新疆意见，但清政府并没有就此执行该意见，而是权衡利弊，在加强海防同时支持左宗棠的主张，于1875年4月，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。就这样，在一片争议声中，左宗棠开始策划和筹措西征。经过一番充分准备后，采取缓进速决的战略方针，用不到两年时

左宗棠抬棺西征

□ 王兆贵

间，成功收复了新疆全境，尔后通过呈请朝廷派出使臣严正交涉，迫使沙俄交还了伊犁。自此，天山南北再次回归中国版图，粉碎了英俄瓜分新疆的图谋，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。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管理和防务，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建议，于1884年设立新疆行省。左宗棠之所以要抬棺出塞，除了鼓舞士气外，也可视为之内心告白：宁可血染沙场，也绝不战败而归，展示了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的壮士情结和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牺牲精神。让那些反对西征的人，瞠目于前，结舌于后。尽管此前他曾说过“胜固当战，败亦当战”之类的话，尽管此后关于他的争议并没有就此消弭。

近现代风云



左宗棠西征运粮图